

文化传统与当下

鬼节杂感

□张志庆

前些天,每到傍晚时分,天刚刚黑下来,在澳门的街边,不断有人烧纸祭祀。一开始我以为是他们家人的祭日,可看见祭祀的人越来越多,有些不解。他们多选择路口的街边,铺张大纸在地上,上面摆上花生、点心、水果,还有四五杯酒,然后点上香,向四周拜拜,口中念念有词。最后把准备好的纸钱、元宝放入一个大大的铁桶中燃烧。很多路口火光熊熊,映照夜空。祭祀的人大部分是中老年妇女,也有带着孩子的。

我偶然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在祭祀,他身边有两个大编织袋,里面装满纸叠的一般大小和

模样的元宝,他告诉我这是家人用两天时间折叠的,他要把它们都放入大桶烧掉,祈求家人平安,驱赶孤魂野鬼不要过来,尤其不要打扰家中小孩。

与街边祭祀的人攀谈,和澳门朋友聊天,才知这是澳门人在过“鬼节”。每年澳门人都要在农历七月初一至十五期间过“鬼节”,在街边祭祀,叫做“烧街衣”。农历七月的鬼节,道教称中元节,佛教称盂兰盆节。在内地,尤其是北方,比较重视清明节。而清明节是祭祀自家逝去的亲人的。澳门人在鬼节,却是烧街衣驱鬼,就是说是给鬼送钱送饭,以免他们前来。

烧街衣的人太多,为了安全,政府在街边路口统一放置了

很多大铁桶,外加一根木棍。烧街衣的人都把祭品放入桶中燃烧、搅动、熄灭。尽管如此,十几天的时间,到处烟熏火燎,到处祭品散落,很不“雅观”,很不“文明”。然而,传统的习俗,家庭的关怀,社区的味道,就在其中熏染着、流动着。

有人说,与内地相比,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习俗在港澳台地区保留得更好更多。在内地的城市特别是“文明”发达的大城市,很难看到类似烧街衣的景象,城市政府往往以安全、卫生等理由,一禁了之,甚至清明节烧纸也有种种限制,如必须在指定地点而无视市民去一趟是否方便。澳门政府的做法很值得赞赏。政府没有提倡,也没有禁止,而是

提供服务。我想,这是很多传统习俗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。

不是吗?在我们一味追求“文明”的过程中,我们逐渐丢失了自己。当我们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,如何能知道往何而去?只能被动卷入“文明”大潮,随波逐流。看着烧街衣的人默默地烧,认真地呢喃,我想,或许他们真的相信鬼的存在。问之,曰:看你自己的了。是啊,有没有鬼,信不信鬼神,本来就不是个科学问题,是信仰问题、心灵问题。科学不能包办一切,“小民”需要慰藉,而“鬼”各种各样、层出不穷。

近闻,日本第四艘“秋月”号导弹驱逐舰下水。二战时,日本的战舰也叫“秋月”,看来军国主义阴魂不散。又见鬼了。



习俗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。也没有禁止,而是提供服务。我想,这是很多传统习俗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。

【悟在当下】

大爱与大孝

吴伯箫纪念馆落成仪式简短而庄重,让我感兴趣的是具体做这件事情的人,既不是他的家人与后人,也不是官方,而是一个民间的公司。将这件事与陶宏开教授戒网瘾这件事一起说,是因为它们都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好传统,体现了我们民族美德中的最重要的部分,那就是,大爱与大孝!

□刘玉堂

说两件互相并无关联的小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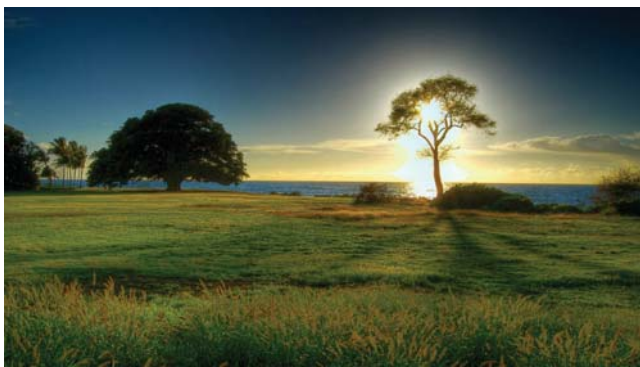
一是去年美籍学者、戒网瘾专家陶宏开教授来济南,我应邀陪他至“宏开心理教育培训中心”授课的时候,听了一首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自弹自唱的《学费》。他在放光盘之前,问孩子们,中国大学生的学费是谁缴的呀?孩子们齐声回答:爸妈——西方国家的大学生呢?孩子们又答,自己——他接着说了一番话:是的,无论他们出身什么样的家庭,都要自己打工挣学费!这首歌曲的背景都是实地实景拍摄的,我请同学们听歌的时候,注意到背景上的故事——

想不到陶教授多才多艺,且唱得情真意切、声情并茂,歌词也朴实无华、实在亲切,让我引用两段:母亲的手啊颤巍巍,眼里闪烁着深情的泪。孩子啊,孩子啊,快快接着吧,这是你需要的学费,需要的学费。父亲的脸上笑微微,眼中放射出自豪的辉。孩子啊,孩子啊,快快拿去吧,这是你需要的学费,需要的学费。啊,这不是金钱,这不是学费,这是父母的爱心,父母的执着,父母的欣慰。他们三百六

五天的风风雨雨,他们三百六十五天的汗汗汗水,他们三百六十五天的计划节俭,他们三百六十五天的辛勤劳累。他们日日夜夜,他们月月年年,他们倾情付出,他们无怨无悔!

歌声中,是父亲在街头给人家掌鞋或卖青菜;母亲在街头缝纫或卖糖葫芦;这边厢,父亲在大学的校园里汗流满面地排队缴学费;那边厢,刚入学的大学生们在树荫下扇着扇子喝汽水——司空见惯的情景,却让好多在场的人流下了眼泪,我也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。

另一件事是,今年的8月10日,是莱芜籍著名文学家、教育家吴伯箫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。泰安市泰山长安园为凸现陵园的人文气氛,于园内建设并落成了吴伯箫先生纪念馆。据悉,吴伯箫先生生前曾留下遗言,希望把骨灰安葬在家乡的泰



山。先生与泰山有着深厚的渊源,在泰山脚下长大,自幼喜爱泰山,特别喜欢“泰山风骨”,纪念馆的落成实现了他的夙愿。

因我正巧有事在泰安,遂受单位领导之托,参加了吴伯箫先生纪念馆的落成仪式,并有幸为先生的塑像揭幕。

纪念馆的布局 and 建筑,如同他的文字,朴素而庄重,简洁而大气,有塑像、有题词,特别在他抗日军政大学结业时,毛泽东主席为他题的“努力奋斗”四个大字,就镶嵌在塑像后面的护墙上,让人心中一震!

有关吴伯箫先生,我只是少

年时学过他的散文《记一辆纺车》,至今还能背过它的开头:我曾经使用过一辆纺车,离开延安那年,把它跟一些书籍一起留在蓝家坪了。后来常常想起它。想起它,就像想起旅伴,想起战友,心里充满着深切的怀念——一种典型的纪实散文的写法,平实而有书卷气。他另外的其人其事,却知之甚少。

正巧,专程去泰安参加吴伯箫纪念馆落成仪式的朋友张期鹏先生,刚出版了一本《吴伯箫书影录》,蒙他馈赠,方知吴伯箫先生的经历。知他出生于1906年,1924年毕业于设在曲阜的省立第二师范学校;192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,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,1941年入党。知他长期从事教育和出版工作,早年即开始业余文学创作,一生创作作品200多篇,成为中国当代卓有成就和影响的散文家。

回来之后,我粗略地读了他

另外的散文,最深的印象是:他可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土八路作家。

落成仪式简短而庄重,却不见吴伯箫先生的家人及后人参加。问及有关人员,说法不一,有说他的儿子生病不能来的,有说吴伯箫先生离家之后,从没回过老家,他的后人就更没回过的。原因则较复杂,可能是先生不幸的第一次婚姻,也可能是历次政治斗争所遗留的诸多伤心与伤感的记忆……

让我感兴趣的是具体做这件事情的人,既不是他的家人与后人,也不是官方或政府,而是一个民间的公司。历史是冷酷的,忘掉一个人很容易,忘掉一个作家更容易。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,在座的就有官员不知吴伯箫是谁。是一些有心人,做起了这件不太容易看出政绩的文化上的事。从创意到建设,再到落成,这中间应该耗资费用不少,他们就那么悄无声息地做起来了,且做得很漂亮,很有意义。

将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说,当然是因为它们都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好传统,体现了我们民族美德中的最重要的部分,那就是,大爱与大孝!



烧煮,汉菜多羹汤,均自幼习之。《说文解字》中,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道:“满菜多把荤素都称为‘菜’,应该源于清代的《随园

“菜”里何时有了肉

□刘绍义

如今的菜,鸡鱼肉蛋,倭瓜葫芦,都包括在内。上街买“菜”也好,酒店点“菜”也罢,“菜”早就既包括素,也包括荤了。但在古代,“菜”只有蔬菜之义,一点也没有荤味。那么,“菜”是何时有了荤意的呢?

《说文》曰:“菜,草之可食者。”《小尔雅·广物》也说:“菜,谓之蔬。”《荀子·富国》记载:“古禹十年水,汤七年旱,而天下无菜色者。”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下》也记载:“孙叔敖相楚,栈饼菜羹。”这里的“菜”都是青菜、蔬菜之义,没

有一点肉味。

先人们开始以菜充饥,是不得已而为之。“尝百草,一日遇七十毒”,也是饥饿所迫。

我国三年困难时期,由于粮食短缺,草根树皮都吃光,更是如此。《内经》说“五菜充饥”,早已解决温饱问题的今天按营养学解释,并无不妥。看来,“菜”字最能解释中华饮食文化的博大内涵和曲折历史。

现在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谈到蔬菜的原产地首推中国,是有科学依据的。

“菜”义的扩大,与荤菜的价格密切相关。明代郎瑛的《七修类

稿》说荤菜的由来与东南沿海渔民有关,那时候蚌肉“贱之如菜”。杜甫也有描写江边渔民生活的诗句:“异俗吁可怪,斯人难并居。家家养乌兔,顿顿食黄鱼。”鱼比蔬菜更便宜,当然“以鱼为蔬”了。但这时并未将鱼归入“菜”中,正像北宋赵与时《宾退录》中说的一样,“《靖洲图经》载,其俗居丧不食酒肉……而以鱼为蔬。今湖北多然,谓之鱼菜”。

到了南宋,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中对“酒煮菜”也发出质疑声,“非菜也,纯以酒煮鲫鱼也。以鱼名菜,窃尝疑之”。这种质疑,在《七修类稿》中同样存在,“杭人食

蚌肉,谓之淡菜,予尝思之,命名不通”。这说明在明代以前,把鱼、肉叫“菜”,还是行不通的。

把荤素都称为“菜”,应该源于清代的《随园食单》中,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道:“满菜多烧煮,汉菜多羹汤,均自幼习之。”这里的“菜”已经既包括素,又包括荤了。从此,“菜”的范围才真正扩大起来,既有了内涵也有了外延。

从单一的蔬菜到含有肉着的“菜”,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,在这个“菜”意扩大的过程中,鱼、肉等荤菜价格低于蔬菜价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